

原文为 LaPolla, Randy. J. 2009. Causes and Effects of Substratum, Superstratum and Adstratum Influence, with Reference to Tibeto-Burman Languages. *Senri Ethnological Studies* 75: 227–237. In Yasuhiko Nagano (ed.) *Issues in Tibeto-Burman Historical Linguistics*.

底层、表层和附层影响的动因和结果——以藏缅语为例

罗仁地 (Randy J. LaPolla)

郑武曦 译

一、语言接触及其结果

近二十年来,语言接触(Language contact)已经成为历史语言学和类型学研究的焦点。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 Thomason & Kaufman (1988) 这本著作的影响,这本著作尝试要把大量语言接触的语料解释清楚。他们认为,语言接触的深度和强度与影响(influence)的数量和种类有直接的关系,这种接触可能涉及一种或多种语言。从本质上来看,双语的程度越高,接触影响的程度就越高(参看 Thomason 2001)。如果接触和双语程度很低,那么就只有少量借词会根据借入语(borrowing language)的音系和语法系统做出调整。但是,如果接触和双语程度比较高,就会影响这个语言的语法和音系。随着更多的语言学家逐渐开始重视语言接触,他们开始意识到语言接触的普遍性。Dixon (1997) 提出“间断平衡(punctuated equilibrium)”的概念,他的观点是,历史上大多数语言是以并列的方式存在(处于一个平衡期),慢慢地,这些语言相互影响。但是偶尔会发生“间断”的现象,通常是自然或人为的灾难引起的人口迁移,或者是一个族群把另一个族群占领了。历史语言学过去关注的是清晰快速的人口变化,而忽视了那些由于长期平衡所引起的缓慢不明显的变化。所有语言接触的研究使得我们思维方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我们意识到语言接触是所有语言演变的一部分,因此我们不能把语言内部的演变与接触引发的演变分开。

当一个社会中存在长期有深度的双语现象时,就会产生以下两种情况:

1. 说一种语言的人最后都变成了说另一种语言。可能是从说一种不太强势的语言转变为说一种更强势的语言,在缅甸南部和泰国说孟高棉语的人就属于这种类型。也有可能是从说一种政治上强势的语言变为说一种更受欢迎,但是地位较低的语言,在英国说诺曼法语的统治者在 2000 年初期转变为说英语。

2. 说两种语言的人继续使用他们的语言,并且保持了语言的独立性,但是这些语言发展出某些结构上的共性,在某些方面与本语族的语言有很多类型学上的差异。比如越南和中国南方的汉语,二者的结构变得很相似。如果一组语言逐渐共享一个重要的类型学特征,那

么它们就可能形成一个语言联盟 (sprachbund) (语言区域)。

就第一种情况来说,从一种语言 (L1) 转为说另一种语言 (L2),即使已经说另一种语言了,如果有很多人都不再说 L1, L2 会表现出很多 L1 对它的影响。L1 对 L2 的影响是底层影响 (substratum influence)。我们在缅甸语的演变过程中可以看到这种类型的变化。在缅甸语的演变过程中,现在缅甸南部说孟高棉语的人开始说缅甸语,缅甸语对孟高棉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缅甸语表现出很多孟高棉语的特征 (Bradley 1980)。相反,如果一种语言的附属语言转变为人口所说的语言,正如 11 世纪以后,在英国说诺曼法语的统治者。如果接触的时间足够长,并且足够广泛 (诺曼法语和英语在英国接触超过 400 年),主要人口的语言可能被附属语言 (superimposed language) 影响,比如英语从诺曼法语借入了很多词和特征 (可能它本身与斯堪的纳维亚语发生了底层接触)。L2 对 L1 的影响属于表层影响 (superstratum influence)。

就第二种情况来说,两种语言都存在,或者是因为它们都同样强势,或者是因为稳定的双语现象,但是这两种语言彼此变得很像。可能是一种语言变得像另一种语言,第二种语言受到的影响较小,正如汉语对缅甸语的影响大于缅甸语对汉语的影响。或者是因为两种语言互相影响,从而使它们二者都发展出共同的类型特征,不同于这两种语言中的任何一种语言。后一种类型是附层影响 (adstratum influence),或者称为语言联盟现象,正如我们在巴尔干发现的语言,这些语言来自很多不同系属的语言,它们之间相互接触,比如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马其顿语、保加利亚语、阿尔巴尼亚语、希腊语和罗马尼亚语,这些语言发展出某些共同的类型学特征 (Friedman 1997)。其他著名的语言区域包括中美洲 (Campbell, Kaufman, & Smith-Stark 1986)、亚马逊地区 (Aikhenvald 2002)、澳大利亚 (Dixon 2001)、欧洲 (Haspelmath 2002) 和东南亚 (Matisoff 1991, 2001)。

在这篇文章中,我想要讨论的是解释显著影响的认知和行为因素在所有这些语言中是相同的。首先,让我们看一看每种现象的一些例子,然后分析引发这些现象的认知和行为方面的原因。

二、影响的表现

底层影响的一个例子是孟语对缅甸语的影响。在 8 世纪之前,孟族 (孟高棉) 控制着缅甸南部和湄南昭披耶河谷 (现在属于泰国)。在 11 世纪,说藏缅语的人被看作是现在缅甸人的祖先,他们征服了孟族,并且建立了蒲甘王朝,推行很多孟族的文化,包括他们的语言,以此作为他们的宫廷文化。缅甸对孟族的控制一直持续到 13 世纪晚期蒙古入侵的时候,当时孟族又独立了。在 18 世纪,缅甸又征服了孟族和之前的孟族地区 (包括伊洛瓦底三角洲和仰光),这些地区与缅甸合并,并且大多数人现在说的是缅甸语。Bradley (1980) 认为,可以在缅甸语中找到很多孟语的特征,因为南部很多人是说孟语,并且之前说孟语的人转为

说缅甸语，这体现了孟语对缅甸语的底层影响。除了很多从孟语借入缅甸语的借词，就音系来看，孟语和缅甸语的元音系统也已经合并；其次是辅音系统，比如在孟语中，齿龈擦音和塞擦音与硬腭或龈腭擦音和塞擦音的对立消失，出现硬腭辅音尾（在书面语中）。但是与大多数汉藏语不同，缅甸语的“声调”与汉藏语常见的声调类型不同，汉藏语的声调更像是可以区别调域的那种声调类型（缅甸语的阿拉贡方言与孟语一样，元音的高低与调域有关。就词的结构来看，缅甸语具有孟高棉语那种典型的一个半音节），第一个“半音节”或者“次要音节（minor syllable）”不重读，第二个音节重读，比如缅甸语中 Burma: “缅甸”这个词的读音是[bə'ma]。

藏缅语有很多表层影响的例子，这是因为大多数藏缅语都是被一个更强势的语言所包围的少数民族语言。其中一个例子是汉语对白语的影响，除了大量的汉语借词以外，我们发现汉语的词序类型也逐渐借入白语，比如动词居中的句法（verb-medial syntax）。在缅甸有景颇语影响日旺语的例子。日旺人生活在缅甸的克钦邦，被看作是属于缅甸克钦族。景颇语是克钦族使用的强势语言，大多数说日旺语的人也可以流利地说景颇语。日旺语已经从景颇语借入了大量的词和一些结构类型，比如用 *pa* 或 *na* 使一个子句名物化（后来从景颇语借入日旺语），还有把名物化的从句作为系动词的补语，用这种方式表达对名物化子句所表达的命题的一种不确定（如例（1-2），引自 LaPolla 2008）。

(1) *à:ngí d'vng a:pmà pà iē.*

[àng-í	d'vng	ap-à	pà]	i-ē
3SG-AGT	完成	DIR-TR.PAST	NOM	系动词-N.PAST

‘我猜他把它做完了。’

(2) *àng tuqám nā iē.*

[àng	tuq-ám	nā]	i-ē
3SG	到达-DIR	PROB	系动词-N.PAST

‘他可能已经到（那里）了。’

表层影响的第三个例子是藏语对藏族文化中的其他语言的影响。比如白马语、嘉戎语和僜人的语言中有很多藏语的借词和特征。比如在白马语中，不清楚是否要把白语看作是藏语的方言，还是一个独立的语言（参看 Chirkova 2005；孙宏开，齐卡佳，刘光坤 2007）。也有强势的印度雅利安语影响印度文化中的藏缅语。比如在这些例子中，我们发现产生了卷舌的塞音和印度语类型（Indic type）的关联结构，这种变化常常包含从印度雅利安语借入的关系代词，比如例（3）是印度北方邦的比托拉格尔地区的 Chaudangsi 语（Shree Krishan 2001:412）。定语从句是由一个或两个从印度雅利安语借入的关系代词 *jo*（有表人类的主语）或者 *jəi*（有

表非人类的主语)构成的。

- (3) a. *hidi* *əti* *siri* *hle* *jo* *nyarə* *ra-s*
 这 那 男孩 是 关系代词(who) 昨天 来-PAST
 ‘他是昨天来的那个男孩。’
- b. *hidi* *əti* *hrəng* *hle* *jəi* *be* *ər* *gum-cə*
 它 那 马 是 关系代词(which) 山 从 掉下-PAST
 ‘这是那匹马掉下来的那座山。’

在印度的语言中有一个经典的附层影响的例子，最早是 Emeneau (1956) 发现的，不同语族的语言已经发展出相同的类型学特征和结构（也可以参看 Emeneau 1980, Masica 1976, Abbi 1991）。在有些地区，不同语言的结构变得几乎一样了，但是很大程度上还保留了不同的词汇形式，比如 Gumperz & Wilson (1971) 描写了印度的马哈拉施特拉邦 Kupwar 村的语言就是这样的。在这个村，有三种不同的语言：乌尔都语、马拉地语（这两种语言都属于印欧语系）和卡纳达语（属于达罗毗荼语系）。因为这个村子里的所有人都会说这三种语言，他们慢慢地相互影响，直到出现一个共同都有的类型学特征，这就是 Ross (2011) 所说的“转喻 (metatypy)”，这不是一个或两个语言演变为相似的第三种语言，而是与三种语言的标准语相比，它们都发生了变化：“事实上，没有哪种语言演变只包括两种语言，排除第三种语言。”所有的语言演变都是把三种语言变体作为一个集合，要么是从一种语言演变为其他两种语言，要么是两种语言演变为一种语言 (Gumperz & Wilson 1971: 163, 这里用原文的方式强调)。正因为这样，Gumperz & Wilson (1971: 154) 认为三种语言之间存在一种“非常高的可译性 (extraordinary degree of translatability)”。例 (4) 可以说明这一点 (例子引自 Gumperz & Wilson 1971: 154)。

- (4) 乌尔都语: *pala* *jəra* *kaʃ* *ke* *le* *ke* *aya*
 马拉地语: *pala* *jəra* *kap* *un* *ghe* *un* *alo*
 卡纳达语: *tapla* *jəra* *khod* *i* *təgond* *i* *bəyn*
 青菜 一点 切 有 拿 有 1SG+来+PAST
 ‘我切了一些青菜，并且把它们带来了。’

在一些例子中，尽管两个语言中的词在大多数情况下形式不同，但结构相同。Gumperz & Wilson (1971: 155) 认为，尽管一个村子里有三种语言，但是只有一种语法系统和语音系统。在藏缅语中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是这些语言是怎样变成一样的结构，即 S. R. Sharma

(2011) 描写的 Rongpo 语，这个语言位于印度北方邦的杰莫利。说这种语言的人也会说印第语和嘎耳瓦里语（它们都是属于印度雅利安语）。Sharma (2011:223–224) 把例 (5a) 作为典型的分词形式 (participial form) 的例子，并且用英语翻译了这个例子。但是他说“实际上，这样的翻译并不能完全接近它本来的意义。印第语的句子更准确。”然后给出了例 (5b) 这个句子。我们可以看到 (5a) 和 (5b) 的结构非常相似。

(5) a. *di phal gyi-tə jəping yǎ.*
 这 水果 我-DAT 吃(eaten) 是
 ‘这个水果是被我吃了。’

b. *yəh phal mera: kha:ya: hua: hai.*
 这 水果 我+POSS 吃(eaten) 是+PAST 是
 giving the sense ‘我有过去吃这个水果的经历。’

印度语言区域（印地语和达罗毗荼语）的共同特征是表示“说”这个意义的动词语法化为表原因的连接标记。Saxena (1988a,b) 列举了例 (6) 和 (7) 来说明表示“说”的动词分别在尼泊尔语（属于印欧语系）和尼瓦尔语（属于藏缅语族）中作为原因连词的一部分 (Saxena 1988a: 379)。

(6) *timiharu madh-e ek jama murkh ho kinabhane yo*
 你们 其中-LOC 一 CL 傻瓜 是 为什么+说+PART 这
dhorohoro hoina.
 塔 是+NEG
 ‘你们其中一个是傻瓜，因为这不是塔。’

(7) *chi-pi cho-mho murkho kho chae-dha-e-sa tho*
 你-PL 一-CL 傻瓜 是 为什么-说-INF-如果 这
dhorohoro mo-khu
 塔 NEG-是
 ‘你们其中一个是傻瓜，因为这不是塔。’

我们又发现这两个语言中表示“说”这个意义的动词都发生了语法化（非同源），演变为表示原因的连接标记，而且整个结构几乎是一样的。我们过去所说的一些‘漂移 (drift)’现象实际上可能是由于附层影响所引起的（参看 LaPolla 2001）。

三、影响的原因

每种语言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种语言的语法和语义类别只反映说话人的认知类别（参看 Whorf 1956, LaPolla 2003）。说话人怎样表达事件状态反映了说话人怎样看待这个事件状态，以及怎样看待一个事件是取决于文化准则（传统）和经验。比如 Heine (1994)，以及 Heine (1997a, b)，Heine & Kuteva (2005) 指出比较级的不同概念（比如一个人超过另一人，出现不同的位置）会决定表达的方式，并且会引发反映这些概念的某些比较结构的语法化。比如，日旺语使用静态位置的概念表示比较（比如，在某些方面，A 在 B 的上面），然而粤语是使用动态的“超多”类型表示比较（在某些方面，A 超过 B）（也可以参看 Ansaldo 1999 讨论了不同类型和例子）。

与认知和语言使用有关的另一个方面是当我们说自己的语言时，我们习惯限制或不去限制听话者用某种方式推测我们的意思（参看 LaPolla 2003）。如果其他语言用一种我们不习惯的方式限制我们的理解方式，我们就会出错。比如说英语的人在说汉语的时候，不会使用第二人称复数代词（而是使用第二人称单数），因为人称代词不会限制他们理解第二人称的数（标准的英语不是必须要区分第二人称代词的数）。另一方面，说英语的人有一个习惯，那就是限制理解动作时间，以及相对于言语行为的时间（在英语中，这是强制性的时标记）。所以，当使用一个没有时标记的语言时，比如汉语，他们在谈论过去的行为动作时，常常过度使用完整体标记，从而满足他们使用过去时标记的习惯。习惯是很难改变的，习惯越是根深蒂固，就越难改变。这就是为什么年龄越小，越容易学习另一种语言：这些年龄小的人说第一种语言的习惯还没有根深蒂固。而这些习惯是妨碍我们学习另一种语言不同的习惯。学习语言没有一个关键时期。第一种语言习惯的特点会导致我们在说第二种语言的时候重读，以及其他错误。

由于这两个方面的原因，当人们学习第二种语言的时候，学习语言的形式只是双语者的其中一个很小的方面，更重要的是学习怎样使用这种形式，并且发展使用母语人才有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方式，这一点只有通过学习母语人的思考方式才可以做到，也就是说，用这种语言的表达方式来思考。显而易见，这意味要学习听这个语言里的音位，因此说日旺语的人学习缅甸语时（正如大多数人所做的），需要形成区分[b]和[p]两个音位的习惯（在缅甸语中，不区分这两个音位是日旺语的一个明显的特征）。从更高的层次来看，这意味着，比如通过某个词推测指称的所指，如澳大利亚英语中 biscuit 这个词的所指比美式英语中 biscuit 这个词指称的对象更多。但是澳大利亚英语中 school 这个词指称的对象要比美式英语少。这也意味着要学习典型的、有代表性的或核心的语义类别，比如当他们听到 soup 或 bread 这些词的时候，母语人想到的是什么，这也是真正的行为。从更高的层级来看，这表示解释语言中的隐喻义。比如用汉语叫某人“猪”与用英语叫某人 pig 是不同的，这表示两种语言用不同的方式使情境和行为概念化。比如，当我们谈论发邮件时，在英语中，我们常常从发送的

角度描绘这个行为或事件，因此我们说 I'm going to send a few e-mails, 也会使用相同的动词或概念来表达送信的意思。然而在中国大陆地区，这是从输入角度的概念，所以人们常说直译的方式是 ‘hit a few emails 打了一些邮件’（这里的 hit 指的是 ‘输入’），当人们谈论 “发送” 一封邮件时，他不会使用和 “寄（邮件）” 相同的词或概念，他会使用 “发（邮件）” 这个动词，“发” 这个词语的意义与英语中的 distribute 更接近。

表层影响的出现是因为说第二种语言的时候，仍然保留了母语的发音习惯、语义和隐喻特征，以及常见的概念。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是 “世界英语（word Englishes）” 的出现，比如印度英语和菲律宾英语。说菲律宾语的母语人学习英语，但是他们主要是和菲律宾人相互交流，因此他们没有必要完全遵循英语母语人的习惯。当他们说英语的时候，他们可以保留他们母语的发音习惯和概念。举一个菲律宾英语的例子，表达交通很差的常见表达方式是 It is bery traptic today. traffic 概念化为一个属性，并且 traffic 词首的发音是真正的 tr-（而不是美式英语中的 t[r-]，-f 发为 -p-，他加禄语的母语人听到 [p] 和 [f] 时，把它们看作同一个音位（very 中的 v- 发为 b- 的音也是同样的现象）。藏缅语地区的五屯话也是一个表层影响的例子，五屯话是汉语受到藏语很大的表层影响。在五屯话中，‘寡妇’ 这个词不是像汉语那样只指女的，而是指寡妇和鳏夫，这反映了藏语的概念化，而不是汉语的概念化。在上面的缅甸语例子中，说孟语的人保留了很多他们孟语的发音、词汇使用和概念化的习惯，然而说缅甸语的时候这不会对缅甸语产生影响。

表层影响也与行为和概念化的习惯有关，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说第一种语言（L1）的人学习第二种语言（L2），并且学会了与这种语言有关的习惯。如果这种语言常常被使用，那么在使用 L2 时习得的新的习惯就能影响使用 L1 的习惯。这与新的音位的产生一样，比如英语受诺曼法语的影响，产生了 [v] 的发音，或者像前面介绍的白语一样，它会影响语言的整体结构。

与附层影响和语言区域有关的因素相同的是：说不同语言的人逐渐具备了 Bhattacharya（1974）所说的 “他们开始有相同的思维方式（new agreements in their outlook of life）”，这里存在 “一个共同的文化核心（a common cultural core）”。或者像 Ross（2001）指出的，说一种语言的人和他们的社区里说另一种语言的人 “逐渐使用相同的方式来解读他们周围的世界（increasingly come to construe the world around them in the same way）”。这句话的意思是他们逐渐开始使用相同的概念化和表达的习惯，并且在很多情况下，他们也逐渐有了相同的行为习惯，比如使用相同的音位系统。

四、结论

我在这里要表达的一个观点是语言的使用是一组行为和概念的习惯，说一种语言的习惯能够影响人们说另一种语言，L1 或者 L2，这些习惯的影响强调了我们所说的对语言的底层、表层和附层影响。在底层影响中，L1 的习惯对 L2 的发音有影响。在表层影响中，L2 的习

惯会反过来影响 L1 的发音。在附层影响中，说话人有两种或更多的习惯相互影响，从而产生一个共同的习惯。最后，我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认知机制和习惯原则和人类行为的其他方面是一样的，比如苯教对藏传佛教的底层影响。

缩略语

AGT agentive marker	施事者标记	NEG	negative maker	否定标记
CL classifier	量词	NOM	nominalizer	名物化
DAT dative marker	与格标记	PART	participial form	分词形式
DIR directional marker	方向标记	POSS	possessive maker	领属格标记
INF infinitive maker	不定式	PROB	probability nominalizer	可能性名物化标记
LOC locative marker	方位格标记	TR.PAST	transitive past tense marker	及物过去时标记
N.PAST	non-past declarative marker			非过去时陈述标记

参考文献:

- 陈乃雄 1982 《五屯话初探》，《民族语文》(1): 10 - 18.
- 孙宏开，齐卡佳、刘光坤 2007《白马语研究》，北京：北京民族出版社。
- Abbi, A. (ed.). 1991. India as a Linguistic Area Revisited. Special issue of Language Sciences 13(2). Aikhenvald, A. Y.
- Abbi, A. (ed.). 2002. Language Contact in Amazon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Aikhenvald, A. Y. and R. M. W. Dixon (eds.). 2001. Areal Diffusion and Genetic Inheritance: Problems in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Ansaldo, U. 1999. Comparative constructions in Sinitic: Areal typology and patterns of grammaticalization. Ph.D. Dissertation, Stockholm University.
- Bhattacharya, S. 1974. Linguistic convergence in the Dravido-Munda culture are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ravidian Linguistics 4: 199-213.
- Bradley, D. 1980. Phonological convergence between languages in contact: Mon-Khmer structural borrowing in Burmese. Proceedings of the Berkeley Linguistic Society 6: 259-67.
- Campbell, L., T. Kaufman and T. Smith-Stark. 1986. Meso-America as a linguistic area. Language 62: 530-70.
- Chirkova, K. 2005. Baima nominal postpositions and their etymology.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28(2): 1-42.
- Dixon, R. M. W. 1997. The Rise and Fall of Languag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ixon, R. M. W. 2001. The Australian linguistic area. In Aikhenvald and Dixon (eds.), 64-104.
- Emeneau, M. B. 1956. India as a linguistic area. Language 32: 3-16.

- Emeneau, M. B. 1980. *Language and linguistic area. Essays by Murray B. Emeneau. Selected and introduced by Anwar S. Dil.*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Friedman, V. A.
- Emeneau, M. B. 1997. One grammar, three lexicons: Ideological overtones and underpinnings in the Balkan Sprachbund. *Proceedings of the 33rd Regional Meeting of the Chicago Linguistic Society*, 23–44.
- Gumpertz, J. J. and R. Wilson. 1971. Convergence and creolization. A case from the Indo-Aryan/Dravidian Border in India. In D. Hymes (ed.), *Pidginization and Creolization of Languages*, 151–6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aspelmath, M. 2002. The European linguistic area: Standard Average European. In M. Haspelmath, E. König, W. Oesterreicher and W. Raible (eds.), *Language Typology and Language Universals: An International Handbook*, 1492–1510.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Heine, B. 1994. Areal influence on grammaticalization. In Martin Pütz (ed.), *Language Contact and Language Conflict*, 55–68.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Benjamins.
- Heine, B. 1997a. *Cognitive Foundations of Grammar.*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eine, B. 1997b. *Possession: Cognitive Sources, Forces, and Grammatica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eine, B. and T. Kuteva. 2005. *Language Contact and Grammatical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aPolla, R. J. 1994. Parallel grammaticalizations in Tibeto-Burman Languages: Evidence of Sapir's "drift".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17: 61–80.
- LaPolla, R. J. 2001. The role of migration and language contact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ino-Tibetan language family. In Aikhenvald and Dixon (eds.), 225–254.
- LaPolla, R. J. 2003. Why languages differ: Variation in the conventionalization of constraints on inference. In D. Bradley, R. J. LaPolla, B. Michailovsky & G. Thurgood (eds.), *Language variation: Papers on variation and change in the Sinosphere and in the Indosphere in honour of James A. Matisoff*, 113–144. Pacific Linguistics.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 LaPolla, R. J. 2008. Nominalization in Rawang.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31(2): 45–66 (Special Issue on Nominalization in Tibeto-Burman edited by A. R. Coupe).
- Masica, C. 1976. *Defining a Linguistic Area: South Asi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Matisoff, J. A. 1991. Areal and universal dimensions of grammaticalization in Lahu. In E. C. Traugott and B. Heine (eds.), *Approaches to grammaticalization*, Vol. 2, 383–453.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Matisoff, J. A. 2001. Genetic versus contact relationship: Prosodic diffusibility in South-East

- Asian languages, In Aikhenvald and Dixon (eds.), 291–327.
- Ross, M. D. 2001. Contact-induced change in Oceanic languages in northwest Melanesia. In Aikhenvald and Dixon (eds.), 134–66.
- Saxena, A. 1988a. On syntactic convergence: The case of the verb ‘say’ in Tibeto-Burman. *Proceedings of the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15: 375–388.
- Saxena, A. 1988b. On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the verb ‘say’: A typological and diachronic study. In S. DeLancey and R. Tomlin (eds.), *Papers from the 3rd Pacific Linguistics Conference*. Eugene: University of Oregon.
- Sharma, S. R. 2001. A sketch of Rongpo grammar. In Nagano and LaPolla (eds.), *New Research on Zhangzhung and Related Himalayan Languages*, *Senri Ethnological Reports* 19, 187–194. Osaka: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 Shree, Krishan. 2001. A sketch of Chaudangsi grammar. In Nagano and LaPolla (eds.), *New Research on Zhangzhung and Related Himalayan Languages*, *Senri Ethnological Reports* 19, 401–448. Osaka: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 Thomason, S. G. 2001. *Language Contact*.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Thomason, S. G. and T. Kaufman. 1988. *Language Contact, Creolization, and Genetic Linguist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Whorf, B. L. 1956 [1940]. Linguistics as an exact science. In John B. Carroll (ed.), *Language, Thought, and Reality: Selected Writings of Benjamin Lee Whorf*, 220–232. Cambridge, MA: MIT Press.

郑武曦，羌族，四川汶川人，2016 年获新加坡国立大学哲学（语言学）博士学位，现工作于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是汉藏语、功能语法、类型学、语用学等。代表作 *A Grammar of Longxi Qiang*。